

中国诗话史

蔡镇楚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中国诗话史

蔡镇楚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中国诗话史

蔡镇楚 著

责任编辑：马小驹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1988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5 插页：5

字数：333,000 印数：1—4,100

平装：ISBN 7—5404—0286—5
I·223 定价：3.80元

精装：ISBN 7—5404—0287—3
I·224 定价：4.95元

DCh

序

这是一部尝试性的诗话史研究专著。

本书凡八卷，计三十余万言，按中国诗话发展演变的时代轨迹编排，分别论述了各个不同阶段诗话创作的社会环境、文学风尚、主要内容、风格流派、基本特征，作家作品及其理论得失、文学地位等问题。以“史”为主，“史”“论”结合，力求达到以下三个目的：（1）以历史的观点，全面探讨中国诗话之体的渊源流别，发展演变的历史全过程；（2）以横向比较与纵向探索相交织的宏观态势，全面分析中国诗话的概念、范畴、基本特征、演进规律，及其诗歌理论体系和诗歌美学的基本层次结构；（3）从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性格的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阐述中国诗话的学术价值和文学地位，及其对中国古代诗歌评论和世界诗歌理论宝库的重大贡献，以继承和发扬中国诗话这宗巨大而丰富的诗歌理论和诗歌美学遗产，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东方诗话学。

诗话之体，自欧阳修创始，崛起于北宋，而后积数代之功，至清代而鼎盛，成为中国古代诗歌评论的一种专著形式。千百年来，中国诗话，作家如林，卷帙繁富，至今不衰，流传亦广，并派生出“朝鲜诗话”和“日本诗话”。然而，诗话这种独特的论诗体裁，毕竟是属于我们中国的！它有别于西方诗学，深深地植根于诗歌国度的皇天后土之中，打上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烙印，体现着中国古朴的民族文化性格。

因此，从事中国诗话研究，必须解决三个问题：一是资料，二是观点，三是方法。鉴于历史原因，中国历代诗话散佚甚多。

又无专集，宛如散落的珍珠，被淹没在集部的汪洋之中。前辈学者郭绍虞、罗根泽对历代诗话的收集整理，钩沉集腋，不遗余力，其金针度人之功，不可泯灭。然而，全面而系统的整理和研究，至今仍处于拓荒阶段。本人才学浅陋，且教务繁忙，但有志于诗话研究久矣。并广泛搜集，搜罗散佚，焚膏继晷，孜孜以求，编成一部较为完备的《中国历代诗话书目》。不过，诗话研究毕竟不同于诗话之整理。这就要求我们在广泛地占有诗话资料的同时，解决一个观点和研究方法问题。资料长篇似的罗列，则无异于何文焕、丁福保式的诗话整理；受“西方文化中心论”的桎梏，以亚里斯多德式的西方诗学的模式来套中国诗话之体，则无益于中国诗话之研究；用传统的线性思维方式，局限于个别作家作品论的微观研究，则无助于诗话研究之思维空间的拓展。

我所从事的诗话研究，曾得到许多著名专家与学林同好的热情的关照和积极的支持，如钱钟书先生、蔡仪先生、钱仲联先生、徐中玉先生，吴奔星先生、陈贻焮先生、马积高先生、羊春秋先生、郭绍虞夫人张方行女士，日本东洋大学船津富彦先生、及我的师友王林、段班县、熊治祁、马小驹等同志，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本书撰写中，曾吸收某些单篇诗话的研究成果，限于篇幅，未一一注明，请见谅。限于条件和水平，本书错谬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海内外专家和广大读者指正。

蔡镇楚 一九八七年秋

目 录

卷一 总 论

第一章	诗话与诗话之源	(3)
第一节	诗话	(3)
第二节	诗话溯源	(7)
第二章	诗话的流变与演进轨迹	(17)
第一节	诗话的流变	(17)
第二节	诗话演进的历史轨迹	(20)
第三章	诗话的学术价值与历史地位	(23)

卷二 宋 诗 话

第一章	诗话之崛起	(37)
第一节	诗话崛起于宋	(37)
第二节	宋诗话的演进轨迹	(49)
第二章	北宋诗话	(57)
第一节	首批诗话之作	(57)
第二节	苏黄诗风与诗话创作	(60)
第三节	苏黄诗风的反思与“江西格”批评	(73)
第三章	南宋诗话	(81)
第一节	诗话创作倾向的转变	(81)
第二节	“中兴四大诗人”与诗话创作	(96)
第三节	“江湖派”与诗话创作	(100)
第四节	宋诗话的压卷之作	(104)

卷三 金 元 诗 话

第一章	金代诗话	(118)
第一节	苏学北盛与金源诗风	(118)
第二节	王若虚与《滹南诗话》	(120)
第二章	元代诗话	(124)
第一节	诗话的衰落	(124)
第二节	诗格的复兴	(130)

卷四 明诗话

第一章	诗话之复兴	(135)
第一节	复兴的背景及概况	(135)
第二节	明诗话的时代特色	(138)
第二章	拟古主义诗话	(148)
第一节	明初尊唐之风与诗话创作	(148)
第二节	“前后七子”诗话	(153)
第三节	“末五子”诗话	(162)
第三章	反拟古主义诗话	(171)
第一节	从《升庵诗话》到《逸老堂诗话》	(171)
第二节	从唐宋派到竟陵派	(184)
第三节	其它诗话之作	(189)
第四章	明诗话的创作得失	(199)
第一节	明诗话的两大系列	(199)
第二节	明诗话的理论得失	(201)

卷五 清诗话

第一章	诗话的黄金时代	(211)
第一节	盛况空前的清代诗话	(211)

第二节	朴学之盛与诗话创作	(221)
第二章	清初诗话	(228)
第一节	宗唐诗派诗话	(228)
第二节	宗宋诗派诗话	(234)
第三节	神韵派诗话	(236)
第四节	王夫之与《姜斋诗话》	(241)
第五节	叶燮与《原诗》	(250)
第六节	“浙中三毛”诗话	(266)
第三章	清中叶诗话	(270)
第一节	格调派诗话	(270)
第二节	性灵派诗话	(281)
第三节	肌理派诗话	(292)
第四节	《北江诗话》与《养一斋诗话》	(295)
第四章	清诗话的专门化	(302)
第一节	地方性诗话	(302)
第二节	专家体诗话	(305)
第三节	中国女性文学史的先河：名媛闺秀诗话	(309)

卷六 近代诗话

第一章	乾坤之变与近代诗话	(313)
第一节	乾坤之变与诗风之变	(313)
第二节	近代诗话的基本特征	(315)
第二章	新派诗话	(322)
第一节	新派诗话的崛起及其影响	(322)
第二节	新派诗话的代表之作	(326)
第三章	旧派诗话	(342)

第一节	旧派诗话的论诗倾向	(342)
第二节	旧派诗话的主要派别	(346)

卷七 现代诗话

第一章	诗话的历史转变	(370)
第一节	“五四”新文学运动与中国诗话	(370)
第二节	旧体诗话的衰落	(375)
第三节	新体诗话的兴起	(379)
第二章	诗话史的新的里程碑	(383)
第一节	鲁迅与《鲁迅诗话》	(383)
第二节	郭沫若与《沫若诗话》	(392)
第三节	《沫若诗话》与《鲁迅诗话》论诗之比较	(400)
第三章	现代诗话发展的新趋势	(405)
第一节	诗话向诗学演进	(405)
第二节	诗话与美学结合	(411)
第三节	中西诗的比较研究	(415)

卷八 诗话之整理研究

第一章	诗话整理与研究之历史	(428)
第一节	宋人的开拓之功	(428)
第二节	清人的集大成之功	(435)
第二章	诗话整理与研究之现状	(442)
第一节	诗话整理与出版概况	(442)
第二节	诗话研究专论的勃兴	(445)
第三节	诗话整理与研究的一面旗帜	(449)

卷一

总 论

中国，素有“诗国”之誉。

几千年的古代文明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部诗歌发展的历史。

在我们这个诗歌国度的皇天后土之中，随着中国古典诗歌的蓬勃发展，特别是唐诗高峰的崛起，一种新兴的、区别于西方诗学的论诗之体——诗话，在北宋欧阳修时代应运而生。

在欧洲，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研究文学理论的著作，一般都称为“诗学”，诸如亚里斯多德的《诗学》等。中国则不同，虽然没有划一的诗学，但是研究文学理论的著作却如百花齐放，万紫千红。欧阳修之前，勒成专著的文学理论之作，有刘勰的《文心雕龙》、陆机的《文赋》、钟嵘的《诗品》、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等等。自欧阳修创始诗话之体，千百年来，中国的论诗之著大多以“诗话”命名，勒成专著的历代诗话之作，数以千计。作家云蒸，作品如林，卷帙繁富，汗牛充栋，显示出蓬勃旺盛的艺术生命力。

任何一门艺术，总是深深地植根于本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沃土之中，打上本民族文化性格的烙印。中国诗话也是这样。它体现的正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形成的正是我们民族所特有的文化传统。中国历代数以千计的诗话之著，是一笔巨大的文学遗产，也是世界文学理论宝库中一颗璀璨耀眼的明珠，闪烁着独特

的灵光异彩。有如此绚丽多姿的诗歌艺术之花，有如此丰硕的诗歌理论之果，我们中华民族理应为之骄傲和自豪，用不着在西方诗学特别是在现代派所谓“表现”理论面前感到自渐形秽！

五四运动以来，学术界对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的研究，由于不自觉地接受了“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影响，大多运用西方文学史观和文艺理论来解释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现象，因此，从未给予中国历代诗话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对这笔诗歌理论遗产，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研究者寥寥无几，非难者却接踵而来。即便是为数不多的研究者，也大多局限于个别作家作品论的微观研究，很少有人对中国历代诗话进行系统全面的宏观研究。诗话研究专著，至今尚未问世。在中国文化史上，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戏曲史、中国音乐史、中国美学史、中国佛教史、中国美术史……都先后问世，唯独还没有一部中国诗话史。可以说，中国诗话还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系统的诗话研究，至今还处于拓荒阶段。

因此，对中国诗话进行系统的科学的整理和研究，继承和发展这笔巨大的文学遗产，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东方诗话学，乃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的光荣使命。著者志大才疏，不揣谫陋，姑且以革命导师恩格斯所倡导的文学批评的两个尺度即所谓“历史观点”和“美学观点”为准绳，立足于中国历代诗话发展递变的历史实际，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高度，对中国诗话进行系统的宏观研究，撰写这部粗略的《中国诗话史》，并以之呈献给养育、栽培我的伟大的祖国和伟大的人民。

第一章 诗话与诗话之源

第一节 诗 话

我们研究的是中国诗话史。

为了把中国诗话放到比较广阔的历史环境和文学背景之中来研究，我们不妨把自己的视野放宽一点，首先探讨一下诗话的概念、特性和艺术渊源。

在中国这个诗的国度里，诗话是一种最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学批评样式。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古往今来人们对于诗话是什么，它有何特性等，都缺乏恰切的表述。比较富有代表性的说法，一般有三种：

(1) 宋人许顥云：“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记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彦周诗话》)

(2) 清人吴秀曰：“诗话者，以局外身作局内说者也，故其立论平而取义精。”(《龙性堂诗话序》)

(3) 今人郭绍虞说：“诗话之体，顾名思义，应当是一种有关诗的理论的著作。”(《清诗话前言》)

这三种说法，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人们对诗话这一概念的基本认识。许顥从诗话创作的内容立论，大体概括了北宋时代诗话创作的主要内容。记得欧阳修始创诗话之际，说他的诗话创作宗旨仅仅在于“以资闲谈”^①。基于这一宗旨，初期诗话之作

① 见《六一诗话》卷首题辞。

大都沿着欧阳修开创的既定路线，以记叙诗事为主，成为“以资闲谈”的记事随笔体式。至许顗所处的北宋末年，情形逐渐变化。许氏总结了当时的诗话创作经验，认为诗话创作以辨析诗歌句法、记叙古今诗事、订正诗歌讹误为主要内容。所谓“辨句法”，是讲诗学方法；“备古今”，是说诗学源流；“正讹误”，是言诗学利病；而“记盛德”，就是指诗学观念了。《易·系辞上》曰：“日新之谓盛德。”所谓“盛德”，旧指美盛的品德而言。许顗从诗话创作的功利主义观点出发，把“记盛德”作为诗话的一种社会职能，这在当时是颇有权威性的诗学观念。至于吴秀所论，则从诗话作者的角度而论，道出了诗话对诗歌的评说特质。所谓“以局外身作局内说”，正是要求诗话作者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对诗歌进行公正的评说。因而立论平正，取义精当。很明显，随着诗话的崛起，其内容不再限于许顗所标举的，诗话的作用也不再囿于欧阳修所倡明的“以资闲谈”了，诗话之体已经超越了闲谈随笔的藩篱，进入到文学理论批评的宏观领域之中。它的内容，大致包括标举论诗宗旨，追溯诗派渊源，评论诗人诗作，摘赏诗歌佳句，漫谈诗歌技法，记叙诗坛轶事，考证诗歌掌故，诠释诗句僻典等等，凡有关诗歌的内容，可以无所不包，无所不论了。这样，欧阳修“以资闲谈”的随笔体记事诗话，逐渐发展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诗歌评论的一种专著形式。所以，郭绍虞先生指出，诗话之体“应当是一种有关诗的理论的著作”。显然，这是广义上的“诗话”，是演变和扩大了的“诗话”，是对诗话所作的现代意义上的解释。

这三种不同的解释，都有其依据，如果把它们看作一个系列的整体，则比较清晰地展现了中国诗话由以记事为主的闲谈随笔到以论辞为主的诗歌专著形式的不断发展、成熟、完善的历史，反映了诗话之体由狭义的诗话向广义的诗话、由初级阶段向高级

阶段发展演变的全过程。然而，遗憾得很，它们并非组成一个系列，因而各自有其表述的不足和理论的缺陷。就许钦、吴琇之说而言，主要是缺乏个性。许氏重内容而忽略其特质，吴氏抓住了诗话重在评说的特质，然而“以局外身作局内说”者又岂止诗话。其他文学评论样式下也同样么？相形之下，还是郭绍虞先生的论断较为全面，诗话的内容和形式都顾及到了，但是总嫌敷衍太过，因为它仅仅限于广义上的诗话，概括不了欧阳修所开创的闲谈随笔式的诗话。

那么，何谓诗话呢？诗话，是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论诗体裁。本人认为，诗话这个概念，就其范围，即概念的外延而论，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诗话，按其内容来说，是诗歌之“话”，就是关于诗歌的故事；按其体裁而言，就是关于诗歌的随笔体，以欧阳修的《六一诗话》为首创，以资闲谈为创作旨归。广义的诗话，乃是一种诗歌评论样式，凡属评论诗人、诗歌、诗派以及记述诗人议论、行事的著作，皆可名之曰诗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诗话之体的演变轨迹，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发展变化过程：

其一曰“话”，以记事为主，讲诗的故事；属于狭义的诗话阶段。

其二曰“论”，以诗论为主，重在诗歌评论；属于广义的诗话阶段。

在中国诗话史上，初期的诗话大都属于狭义的诗话，如欧公的《六一诗话》、温公的《续诗话》、刘敞的《中山诗话》等，创作目的在于“以资闲谈”，创作重心在于“记事”。这是诗话发展的初级阶段。如果诗话之体仅仅停留在这一初级阶段，那就没有多大学术价值了。象世界上任何事物不可能永远停止在一个水平上一样，诗话之体经历了“闲谈”、“记事”的初级阶段，在不断的创

作实践中，终于以新的面貌、新的姿态步入了诗话发展的高级阶段——广义的诗话。诗话创作不再以“资闲谈”为目的，诗话的内容不再局限于“记事”，诗话的重心从诗的故事转到诗论，从说部转为诗评，从诗本事转向诗学、文艺论与美学论了。可以说，这种广义的诗话，是对原来那种狭义诗话的概念上的一种超越。我们应当承认，在中国诗话史上，诗话这种在概念上的超越，即由狭义的诗话向广义的诗话的历史演变，乃是质的飞跃，是诗话之体逐渐发展、成熟、完善的标志，是诗话创作上的一场具有积极意义的重大变革。

诚然，从发展的观点来看，我们应该为广义的诗话在概念上对狭义的诗话的这种超越喝彩，但是也必须看到，这种概念上的超越，也容易导致诗话概念的混乱。如果照郭绍虞先生的提法，岂不是一切“有关诗的理论的著作”都可以称之为“诗话”？这就失之太宽了。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其所以千差万别，千变万化，根本依据或内在原因，正在于它们各自具有不同的个性和本质特征。诗话也是一样。作为中国所特有的一种论诗之体，诗话的个性，是闲谈式的，随笔式的；诗话的风格，是轻松的，自由活泼的；诗话的体制，是由一条一条内容互不相关的论诗条目连缀而成，是富有弹性的。因此，诗话的本质特征，不同于冗杂荒诞的笔记小说，也不同于诗品、诗评、诗论、诗说、诗式、诗格之列，因为“诗品”、“诗评”、“诗论”，侧重于诗的评骘议论，指出是非得失，风格过于严肃；“诗说”、“诗式”、“诗格”，侧重于诗句的诠释，指明作诗方法，阐述诗歌创作准则，内容过于单调划一，不符合诗话之体的个性与风格。研究中国诗话，就必须弄清楚诗话的范畴，从中国古代数以千万计的论诗之著述中确定哪些是诗话，哪些不

是诗话。本人认为，诗话必须具备以下三个基本要素：

第一，必须是关于诗的专论，而不是个别的论诗条目，甚至连古人书记跋序中的有关论诗的单篇零札，也不能算作诗话。

第二，必须属于一条一条内容互不相关的论诗条目连缀而成的创作体制，富有弹性，而不是自成一体的单篇诗论。

第三，必须是诗之“话”与“论”的有机结合，是诗本事与诗论的统一。一则“诗话”是闲谈随笔，谈诗歌的故事，故名之曰“话”；二则“诗话”又是论诗的，是“论诗及事”与“论诗及辞”的契合无垠，属于中国古代诗歌评论的一种专著形式。

根据这三个基本要素，并以此为标准，诗话的范畴则比较容易确定，诗话的界说也比较容易分辨了。只要符合这几条标准，具备这三大要素，欧阳修之后，不论是标名“诗话”的，还是未标名诗话的，都可以视为“诗话”；同时，也只有具备这三条标准者，才能称之为“诗话”，缺一不可。这样，既可以避免失之过宽，又可以避免失之过窄。

第二节 诗话溯源

关于诗话的源流，前人曾做过许多有益的探溯，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里主要介绍四种比较富有权威性的说法：

(1) 诗话昉于三代说

清代著名的诗话研究专家何文焕认为，诗话始于三代。他指出：

诗话于何昉乎？赓歌纪于《虞书》，六义详于古序，孔、孟论言，别申远旨，《春秋》赋答，都属断章。三代尚已。汉魏

而降，作者渐夥，遂成一家言。洵是骚人之利器，艺苑之轮廓也。（《历代诗话序》）

所谓“三代”，指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夏、商、周三个朝代。这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时期，是中国第一部伟大的诗集《诗经》诞生的时代。何氏认为诗话始于三代，其立论依据主要在于《虞书》之纪虞歌，《诗大序》之详六义，以及孔、孟论《诗》之片语只言等等。此外，还有姜曾，他在《三家诗话序》中说：

或谓自钟嵘《诗品》而后，诗话充栋，大都妄下雌黄，无裨诗教。然观吴札观乐，不废美讥；子夏序《诗》，并论哀乐，即诗话之滥觞也。（《清诗话续编》第四册）

姜氏之论与何氏略有不同，认为“吴札观乐”、“子夏序《诗》”，就是“诗话之滥觞”，较昉于三代说更为实际具体，但依然持诗话始于三代之说。

（2）诗话本于钟嵘《诗品》说

清代著名史学理论家章学诚在论及诗话之源的时候指出：

诗话之源，本于钟嵘《诗品》。然考之经传，如云：“为此诗者，其知道乎？”又云：“未之思也，何远之有？”此论诗而及事也。又如“吉甫作诵，穆如清风，其诗孔硕，其风肆好”，此论诗而及辞也。事有是非，辞有工拙，触类旁通，启发实多。江河始于滥觞，后世诗话家言，虽曰本于钟嵘，要其流别滋繁，不可一端尽矣。（《文史通义·诗话》）